

热历史

唐代人怎么过上巳节

□张勃

农历三月初三，是上巳节。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，已经被今人忽略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；而在唐代，它却是法定放假的重要节日。

“赐欢仍许醉，此会兴如何。翰苑主恩重，曲江春意多。花低羞艳妓，莺散让清歌。共道升平乐，元和胜永和。”

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一次上巳节，白居易参加皇帝主持的曲江宴会后，留下了上面那首即事诗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恩、欣喜之情。诗中的“永和”指的是东晋永和九年上巳节的兰亭集会。这次兰亭会因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而流芳百世。被誉为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的这次兰亭集会，无疑是上巳节发展史上的一个丰碑。不过在白居易眼里，“元和胜永和”，他参加的这次曲江宴会是比兰亭集会更胜一筹的。白居易的个人书写有无溢美之词，我们不好揣测。但在上巳节悠久的发展历史上，唐代的确是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。

唐代之前的上巳节

上巳节的得名源于过节的时间。我国古代曾流行干支纪日法，上巳节时在三月第一个巳日，故而得名，也称“元巳”。魏晋以降，上巳节相对固定在三月初三日，因此又称“三月三”。

上巳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，有学者认为早在周代就已经出现，起源于兰汤辟邪的巫术活动，也有的认为源于先民的生殖崇拜活动，或源于原始社会的性禁忌制度。而民间也有多种传说。其中一则与西周时期的周昭王有关，传说周昭王伐楚失败后淹死在汉水，两个叫延娟、延娱的女子挟拥着他一同沉没，当地人十分同情他们，每到上巳日就进行祭祀。另一则传说讲的是汉代人郭虞生有三个女儿，其中两个出生在三月上辰日，一个出生在上巳日，不幸的是，三个女儿在两天之内先后死亡，大家以为不吉利，所以都到水边洗浴清洁，以消除不祥。民间传说作为节日起源的解释虽不足凭信，却反映了上巳节最初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凶日的事实。也正因此，祓禊（音“服戏”，即在到水边洗濯去垢，以驱凶祈吉——编者注）就成为上巳节兴起最早也最重要的习俗活动，并且是从上到下、全民参与的习俗活动，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就载：“是月上巳，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。”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上巳节的习俗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人们不仅到水边洗手濯足，还有将酒洒到河中、将鸡蛋和枣投到水里的做法，并形成列宴作饮、曲水流觞之俗。曲水流觞就是人们结伴到水边祓禊后，坐在弯曲的水流两旁，在上游放置酒杯，酒杯顺流而下，停在谁的面前，谁就取杯饮酒。文人们追求风雅，不仅饮酒，还要赋诗。前面所说的兰亭集会就是如此。“曲水”有的是天然流水，有的是人工设置。最早的人工曲水流觞，是曹魏时在洛阳御苑中建造的“流杯石沟”和“禊堂”。据《宋书·礼志》记载：“魏明帝



▲唐人欢度上巳节场景

天渊池南，设流杯石沟，燕群臣。”这一做法影响深远，今天在北京，故宫博物院的宁寿宫花园里还有禊赏亭，亭中可感受曲水流觞的韵味。

因为上巳节和水密切相关，为了增加娱乐性，魏晋时期还发明了水上“百戏之具”，到隋朝更将其发扬光大。隋炀帝曾经让人造“水饰”72种，并在上巳节召集大臣欣赏。这些水饰有人物，有禽兽鱼鸟，都用木头雕刻而成，“或乘舟，或乘山，或乘平洲，或乘宫殿，木人长二尺，衣以绮罗，装以金碧，及作禽兽鱼鸟，皆能运动如生，随水曲而行”，精妙绝伦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经过数百年的发展，到唐代，在相对安定、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，上巳节达至其生命的鼎盛，成为官民最看重的节日之一，堪称春天的狂欢节。

令节推元巳

过节是需要时间的，唐代将过上巳节的时间用制度化的方式进行了规范。

在我国，至少从秦汉时代起，国家公务人员已有休沐和告宁制度，但普遍给节日放假，是始于唐代。在唐玄宗开元七年就有上巳节放假一天的规定，唐德宗贞元四年颁布《三节赐宴赏钱诏》，更将其定为“三令节”之一（即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，三月三日上巳节，九月九日重阳节。——编者注），鼓励大家快乐过节，规定三节时，“宜任文武百僚，择胜地追赏。”同时给予制度化的资金支持。此后，上巳节宴会蔚然成风，不仅皇帝“赐群臣大宴，登高临流，与时所宜”，就是地方官员，也得以“自宴其僚属”，从而成为大唐兴盛的重要表征。

“令节推元巳”。上巳节当然不是上层官员的专属“令节”，它是大家共同的“令节”。“三月初三，千家与万家。蝶飞秦地草，莺入汉宫花。鞍马皆争丽，笙歌尽斗奢。”唐代诗人殷尧藩的这首《上巳日赠都上人》，所描写的正是不分男女、不分老少、不分上下的狂欢场面。

倾都祓禊晨

祓禊是上巳节的标志性活动，

“巳日帝城春，倾都祓禊晨。”唐代人依然沿袭到水边洗濯的做法。不过，与之前人们喜欢在水边洗濯不同，唐代人更愿意乘着船一边饮酒一边游玩。宋之问曾泛舟昆明池，目睹了“桃水涨而浦红，苹风摇而浪白”的良辰美景；卢纶则奉陪浑侍中泛舟渭河，共同领略了“青舸锦帆开，浮天接上台。晚莺和玉笛，春浪动金罍”的优美风情……

伴随着舟船成为许多唐人在上巳节的活动空间，船上、水中的活动变得丰富起来。人们在船上设宴禊饮，歌舞奏乐。唐文宗开成二年（公元837年）三月三日，白居易、刘禹锡等15人就在洛水“合宴于舟中”，他们“由斗亭，历魏堤，抵津桥，登临溯沿，自晨及暮，簪组交映，歌笑间发，前水嬉而后妓乐，左笔砚而右壶觞”，潇洒风流，引来众人围观。

当时人们还在船上安排百戏表演，甚至出现竞渡的盛况。符载的《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》对此有集中描写：“其降车也，鼙鼓发；登舟也，丝桐揭；解缆也，百戏作。”又有竞渡之戏：“一号令，雷鼓而飞，千桡动，万夫呼。闪电流于目眦，羽翼生于肘下。”激烈的争夺引来众多的观看者，他们欢呼着呐喊着，为自己心仪的船只加油助威，场面十分热烈。宫中也有竞渡的做法，宫女们则是重要的参与者。“猩猩血彩系头标，天上齐声举画桡。却是内人争意切，六宫罗袖一时招。”一千多年前宫廷竞渡活动的热闹繁华，就这样从张祜《上巳乐》有声有色的描写中迸发出来。上巳竞渡是唐代人的新发明，它无疑扩张了上巳节的声势，也进一步激发了上巳节的生机与活力。

满园赏芳辰

上巳节是一个春天的节日。此时恰值莺啼柳绿、繁花似锦，踏青游玩便成为节日里的亮丽风景，曲江一带更是踏青游玩的好去处。曲江位于唐都长安东南部，因“其水曲折似嘉陵江”而得名。这里“菰蒲葱翠，柳阴四合”，亭台楼阁星罗棋布，是著名的风景胜地。上巳节时，皇家在此招宴，百姓们也来踏青赏春，以至平时找都找不到的人，却在这里不期而遇。许棠有首诗很好地描状了曲江三月三日的盛况：“满园赏芳辰，飞蹄复走轮。好花皆折尽，明日恐无春。鸟避连云幄，鱼惊远浪尘。”整个长安城的人都出动了，马蹄飞奔，车轮滚滚。美丽的花朵纷纷被折，恐怕明天就看不到春天的样子了。小鸟们慌忙避开高高搭起的帐篷，鱼儿们则被远处的浪花吓得钻进水中……春天的景色如此动人，欢娱的生活如此令人不舍，“绿水残霞催席散，画楼初月待人归。”踏青游玩总是要到天色暗下来方才罢休。

上巳节是前人留给唐代人的文化遗产，唐代人则通过自己的节日生活继承了这份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。上巳节的不少活动，如踏青、泛舟、竞渡等都是前代上巳节罕见的，但在唐代都成为时人过节的重要方式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如果我们将上巳节的历史比作一根长长的链条，唐代无疑是其中最夺目的那一环。

（《光明日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薛瑄谈读书

□林德培

薛瑄，字德温，号敬轩，明代政治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家、河东学派的创始人，有《读书录》《薛文清集》传世。

读书有“雅郑”之分

在《读书录》中，薛瑄写道：“岂独乐有雅郑邪？书亦有之。小学、四书、六经，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圣贤之书，雅也，嗜者少也，何故？以其味之淡也。百家小说、淫词绮语，怪诞不经之书，郑也，莫不喜谈而乐道之，盖不待教督而好之者矣。夫何故？以其味之甘也。”

薛瑄认为，不单乐有雅郑之分，书亦有之。雅即雅乐，宫廷音乐；郑，即郑声，儒家认为郑地音乐是“淫邪之音”。在他看来，雅者，味之淡薄，喜之者少；郑者，味之甘甜，喜之者多。薛瑄把书也分为雅郑，主张读书要读雅书，多读儒家经典和理学派之书，不能沉迷郑书而使人心迷失，歪念增生。

读书功夫在“寻思”

薛瑄在《读书录》中写道：“读书记得一句，便寻一句之理，务要见得下落，方有益。先儒谓读书只怕寻思，近看得‘寻思’二字最好。如圣贤一句言语，便反复寻思：在吾身上，何者为是；在万物上，何者为是。使圣贤言语，皆有着落，则知一言一语，皆是实理，而非空言矣。”

薛瑄强调，读书要做到边读书边思考。思考经典书目中每一句话的道理所在、含义所在，思考行文的来龙去脉。对古代圣人之言，更要反复寻思，联系自身、联系万物去探究。如此，读书才有收获。

（《梅州日报》）



书场景 薛瑄纪念馆薛瑄教子读

文史拾零

古代儿歌

□汪胜

明代吕坤所编《演小儿语》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儿歌集。他收集了流传在河南、山西、山东、陕西等地的46首儿歌，并将其编撰成书。这些儿歌文字浅显，内容生动活泼。如《打哇哇》：“打哇哇，止儿声，越打越不停。你若歇了手，他也止了口。”吕坤当时出于“训蒙之用”对很多歌谣进行了修改，并在每一首儿歌下面加了评语。尽管如此，《演小儿语》“利用儿童的歌词，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，确是不可多得的”。最重要的是，《演小儿语》使后世的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了解古代儿歌的概貌，也使古代的一些儿歌得以保存。

清代郑旭旦所编撰的《天籁集》成书于康熙初年，郑旭旦在书中最早提出儿歌是“天籁”的说法：“天机活泼，时时发现于童谣。”书中收集吴越地区儿歌48首。一类是反映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，这类儿歌既有成人创作的，也有儿童随口编唱的。这类儿歌有的用于游戏，如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”。有的类似于绕口令，锻炼儿童的思维和语言，如“一颗星，挂油瓶；油瓶漏，炒黑豆”。还有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意义。另一类则是表现成人的生活，主要由成人创作向儿童传唱，儿童虽然不懂儿歌的内涵，但音律上的节奏感往往使儿童乐于接受并传诵。

继《天籁集》之后，清代悟痴生共收集吴越儿歌23首编撰成《广天籁集》，因其内容和形式都与《天籁集》相似，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两本儿歌集相提并论。例如钟敬文先生在《民间文学概论》中提到，“清代郑旭旦的《天籁集》和悟痴生的《广天籁集》中，记载了近七十首儿歌，为我们保存了极宝贵的古代儿歌资料”。

（《北京晚报》）